

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中华历史丛书

仓修良著

中华历史丛书

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仓修良著

中华书局

1984年·北京

中华历史丛书

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仓修良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6³/₄·印张·156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256 定价: 1.05元

目 录

第一章 章学诚生活的时代

——“乾嘉盛世”的社会特点

一 “乾嘉学派”是清朝统治者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	1
(1) 大兴文字狱, 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	1
(2) 笼络士人、粉饰太平, 大开“三通”、“四库”馆 ·····	6
二 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风·····	8
三 在“乾嘉盛世”的背后·····	13

第二章 穷困潦倒的一生

一 “意气落落, 不可一世”的青年时代·····	17
二 学问“不合时好”而不敢入仕的中年时代·····	23
三 为人幕僚, “坎坷潦倒”的晚年·····	37

第三章 《文史通义》编著的目的、

内容和版本

一 《文史通义》编著的过程和著作目的·····	56
(1) 《文史通义》编著经过·····	56
(2) 《文史通义》著作的目的 ·····	57
二 《文史通义》的内容和版本·····	62

第四章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学术 思想的结晶

一 不彻底的唯物论思想·····	68
二 进化论的进步史观·····	75
三 反对英雄史观·····	83
四 可贵的治学经验·····	86
(1) “为学之要，先戒名心”·····	86
(2) “札记之功，必不可少”·····	87
(3) “学贵博而能约”·····	90
(4) “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	92
五 “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	95
六 史家著述之道“贵知其意”·····	99
七 “六经皆史”说的阐明·····	101
(1) 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争论·····	101
(2) 章学诚言“六经皆史”的论据·····	112
(3)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意义·····	114
(4) 批评戴震不能说是章氏“六经皆史”的糟粕·····	121
八 史家必须具备“史德”·····	131
九 主张文人不能修史·····	138
十 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143
(1) 对史体的评述·····	143
(2) 创立新史体，改造旧史籍·····	151
(3) 主要编修通史·····	153
(4) 纪传体史书应增立《史官传》·····	156
(5) 区分史籍为撰述、记注两大类·····	159
(6) 重视工具书的编纂工作·····	161
(7) 扩大史学的范围·····	163

十一 阐发方志理论, 创立方志学·····	166
(1) 方志的起源和演变·····	166
(2) 方志的性质和作用·····	168
(3) 方志分立三书 ·····	171
(4) 志书的体裁和内容·····	176
(5) “方志辨体”的贡献·····	183
(6) 建议州县设立志科·····	184
十二 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局限性·····	186

第五章 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

一 清代浙东史学的概况·····	189
二 清代浙东史学的特点·····	192
(1) 反对门户之见 ·····	192
(2) 贵专家之学 ·····	197
(3) 主张学术经世致用·····	199
三 需要辨清的几个问题·····	203

第一章 章学诚生活的时代—— “乾嘉盛世”的社会特点

一 “乾嘉学派”是清朝统治者 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

（1）大兴文字狱，加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统治

乾嘉时代，被看成清代历史上的一个“盛世”。而“乾嘉学派”又被视为这个“盛世”学术繁荣的象征。其实乾嘉学派是清朝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众所周知，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历史上一次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许多具有唯物主义和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吕留良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大都反对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的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不同程度地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进行了批判。在这方面尤以黄宗羲表现最为突出，他在其名著《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这就是他对君

主专断的有力抨击。他主张做官的人都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并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因此，不能“私其一人一姓”。可见他敢于用“为天下”去否定“为君”，用“为万民”去批判“为一姓”，这无疑是与长期以来所宣传的“君为臣纲”针锋相对。这种思想对当时和后来影响都很大，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们在搞维新运动时，就曾把《明夷待访录》一书大量印刷，作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宣传品。顾炎武在政治方面也反对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治学方面，他反对空谈，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指斥明末的学风是专门清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造成了“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因而他强调踏实钻研的学风，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二》）。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之编著，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当时许多著名学者，他们著书立说，也都和顾、黄诸人一样，抱有明显的“经世”目的。因此当时的学术空气非常活跃，各种有价值的著作也都应时出现。从思想学术领域来看，确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可是这种局面的出现，却使清朝统治者感到惶惶不安，他们很快意识到，如果让这种局面自由发展下去，势必冲击封建统治，对于政权的巩固将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于是便决定以高压手段，对“掉弄笔墨”的士人给以创惩，大兴文字狱，来打击“经世致用”思想，残杀富有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以此加强对学术思想的控制。

文字狱虽是古已有之，不过各代文网的疏密是有所不同的。明清时期的文网，则远远超过前代，而清代文字狱的凶残较之

明代,则又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清初顺治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文字狱。到康熙时又兴起一连串的文字狱,初年有所谓“明史案”,时浙江归安(今吴兴)富户庄廷钺购得明万历年间大学士朱国祚编著的《明史》,原书未完,庄廷钺请人续完刻印,其中涉及李成梁与建州卫的关系和明末抗战事迹,为落职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遂兴大狱。时庄廷钺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其父兄弟侄等家属亦处极刑。此外,凡是作序者、校补者、刻印者,甚至售书者、买书者都惨遭杀戮,共死了七十二人,充军的更不计其数。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被顾炎武“视为畏友”的吴炎(字赤溟)、潘耒(字力田)两位年轻有为的史学家,亦不幸死于此案。吴、潘俱为吴江名士,本未参与庄氏《明史》的参校工作,时二人正专意撰著《明史记》。但庄氏倾慕二人盛名,遂刊其名于序中,于是二人均遭杀身之祸,康熙二年五月,“俱磔于杭州弼教坊”。他们都长于史学,两人合作,仿《史记》体例撰《明史记》。顾炎武对他们十分敬慕,将自己所藏有关史料千余卷都借给了他们,《明史记》于二人遇难时被抄没焚毁,顾炎武所借的藏书也被一并烧毁,这是明史研究上的一大损失。康熙末年又有“南山集案”,清翰林院编修桐城人戴名世著有《南山集》,书中多处引用了同乡人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记永历政权抗战事迹,并主张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在《明史》中应立本纪,被人告发,戴名世及其族人皆被杀;孝标已早死,被戮尸,族人被杀的亦很多。方、戴两族未被杀的皆流放于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等地为奴。这次文字狱死者一百多人,流放者数百人。雍正时期有“吕留良案”,这和“明史案”、“南山集案”同为清初的大案。湖南诸生曾静,收得浙江学者吕留良(崇德县人)遗书,接受其中有关“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学说,著有《知新录》一书,提出清朝入主中原,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遭到了破坏,他号召恢复“井

田封建”（即指文化传统）。同时书中还揭发了清廷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种种痛苦和雍正帝夺取帝位前后的阴谋行为，以及贪财残忍的性格（见《大义觉迷录》中所引《知新录》说法）。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派遣他的弟子张熙到西安见清川陕总督岳鍾琪，劝他起兵反清，岳鍾琪反向清廷告发，曾静、张熙及吕留良之子毅中等皆被捕。而抄出的吕留良诗文中又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等句，更成为残酷镇压的口实。雍正亲自审问后，杀害了吕毅中等人，吕氏子孙则被发配宁古塔为奴，但却把曾静、张熙释放了，目的是为了利用他们替清廷宣传，欺骗人民。同时又将曾静等人的口供，以及雍正帝和曾静的辩论词、雍正反驳吕留良思想的谈话等编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这是对死者公开的口诛笔伐，对生者的严厉警告。此书一直发到全国各地学校，迫令士人阅读，其用心是从根本上消除反清思想。对此梁启超曾发表过评论，认为作为一个帝王亲自著书数十万言“和一位儒生打笔墨官司，在中外历史上真算得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为研求真理而相辩论，虽帝王也该有这种自由”。但仔细搜求他的行径，“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发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象这样子，那里象是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纪教皇的牌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自此以后，文网愈密，动辄犯忌，令人心寒。尤其是“明”、“清”二字，更不可随意使用，因为由于清统治者猜疑过甚，往往望文生义，为了一两个字就可以把人定为“大逆”。用当时办案大员的话来说，就是“推求其意，悖逆显然”（《清代文字狱档》第八册《署两江总督高晋奏折》，《阎大鏞侯集案》）。这就是说，“悖逆”乃系“推求其意”而得出。于是，许多人就是因为“推求其意”而丧了性命，从而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雍正时江西考官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因出试题涉

嫌，被拿问罪。据《永宪录》载：查嗣庭“今岁（雍正四年）典试江西，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背谬。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更不知其何所谓。《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辞文，其寓意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语相同。”查嗣庭因此获罪，加之又检其笔札诗抄，认为语多悖逆，心怀怨望，革职拿问，死于狱中，戮尸枭示，亲属被杀或被流放。次年，雍正以汪景祺、查嗣庭均为浙江人，认为浙省士风浇薄，玷辱科名，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六年。后来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中因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之句，被指为有意讥讪而遭惨杀。乾隆时期，更是有增无已，据史料记载，仅乾隆一朝即兴文字狱七十一起，这也可说是空前的。案件原由则大多为“妄议朝政”或“讥讪朝政”，可见这时打击的矛头主要针对“经世致用”思想。而其挑剔程度亦比前更为苛细，往往都是由望文生义，经过“推求其意”而定的案。如徐一夔《一柱楼诗集》里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麟《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等诗句，都因涉及了“明”、“清”的字样，竟被定为重案。更有甚者，卓长龄《忆鸣诗集》案，则是把“忆鸣”二字经过“推求”之后，变成了“忆明”，然后按“大逆”定了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如此，各级官吏、爪牙自然纷纷迎合。这不仅表现在那些办案官吏往往轻罪重办，从重拟罪上，而且表现在有些无耻之辈为了营谋私利，则

乘机挟嫌诬陷，遂使告讦之风纷然而起，大批无辜士人含冤丧命。当时御史曹一士向乾隆的上疏中就曾指出：“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鞠，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指在野未出仕的人）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清鉴纲目》459页，又见《清史稿·曹一士传》）可见由于文字狱的屡兴，告讦之风的盛行，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坏人受奖升官，好人惨遭杀戮，是非不分，荣辱颠倒，学者们的思想自由、著作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清初学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亦被扫荡无遗。因为谈论“经世”，免不了要涉及时政，开口便触忌讳，遂使人人都深具戒心，钳口不谈，而这又正是当时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还值得指出的是，康熙、雍正兴了许多文字狱，但杀人并不毁书，乾隆则由文字狱进而焚书、禁书，由查缴禁书又屡兴文字狱。因此，从乾隆六年（1741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七年中，兴文字狱五十三次之多。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反映了封建末世反动统治阶级的没落性、疯狂性和腐朽性。

（2）笼络士人、粉饰太平， 大开“三通”、“四库”馆

清朝统治者建立初期，企图用武力镇压民气，事实证明成绩不大。又企图用程朱理学闭塞民心，如康熙时重新刊行了明代编纂的《性理大全》，辑刊了《朱子全书》，编写了《性理精义》，并重用“理学名臣”辅佐政治，但收效甚微。于是转而采用文化专制主

义。在文化政策上又采用了高压与怀柔两手，用高压手段控制社会舆论，以怀柔姿态粉饰社会太平。前者通过大兴文字狱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者则表现为利用特科（在进士之外的特别科目）对知识分子进行笼络和收买。鼓励士人埋头书斋，尽量增加他们跻登仕途的机会。这一政策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开始，康熙十二年曾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又借纂修《明史》为名，举行博学鸿儒科，罗致了全国的“名士”一百四十三人，取录了五十名，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不过，正如梁启超所说，被收买的都是些二三等人物，那些身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一再避不应征，就如万斯同虽然秉父师之命参预编修《明史》，为的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他“不署衔，不受俸”，始终以布衣参其事。此外还召集大批文士编辑《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康熙字典》、《全唐诗》（九百卷）、《朱子全书》等许多大部头书籍。雍正、乾隆朝除继续举行博学鸿儒科外，又有《永乐大典》的缮写、续《三通》的编修、武英殿的刻书等。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编纂，竟网罗学者三百余人参预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下令设置《四库全书》馆，以纪昀为总裁，编纂《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作一次古今图书的结集，实际上仍是在于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借机检查各种文献，进而销毁反清和反对封建统治的著作。清廷当时的命令就曾明确指出：“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各省已经进到之书，见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东华录》乾隆朝卷80）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销毁、篡改、抽毁、禁绝的范围，不独限于反清文献，就是宋人言金事、明人言元事的书籍亦在其列，甚至内容与封建制度有所抵触或“辞含激愤，意存感慨”者亦不免于被销毁。从乾隆三十九

年至四十七年（1774——1782年）的八年间，根据当时清政府的报告，共烧书二十四次，烧毁的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实际上被毁之书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江西省即销毁八千部以上。据孙殿起辑的《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云，乾隆时期，“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可见被销毁书籍之多，实在令人吃惊。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大浩劫。

另一方面，由于《四库全书》馆的设置，网罗了大批学者，从事于整理、考订古典文献，这样一来，引起了整个社会学风的巨大变化。章学诚的友人邵晋涵、周书昌以及戴震等人都被“特征修四库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而戴（震）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上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瓊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赅赅乎移风俗矣”（《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可见《四库全书》馆设置以后，使得许多学者纷纷抛弃诗赋举子艺业，致力于训诂名物的考订工作，考据之风逐渐取代了“经世致用”的“实学”。因此，可以说这些做法，收到了比之文字狱更为显著的效果，也许这是清朝统治者所料想不到的。

二 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风

乾嘉时代，在清朝历史上被称为“盛世”，乾嘉时代的学术文化，也被看成清朝学术文化的繁荣时期。其实这种所谓“盛世”和“繁荣”，正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产物。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目的在于禁锢人们思想，钳制言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其结果，使得广大知识分子钳

口不言，为了明哲保身，避嫌免祸，绝大多数有志于学问的读书人，便一头钻进故纸堆中，大搞训诂名物，专力从事三代秦汉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因为这一工作不仅保险，而且也有出路，这是当权者所提倡的，于是遂逐渐形成了一代学风。梁启超曾说：“凡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排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状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又说：“康熙中叶，文网极宽，思想界很有向荣气象。此狱（指戴南山案）起于康熙倦勤之时，虽办理尚属宽大，然监谤防口之风已复开矣，跟着就是雍正间几次大狱，而乾嘉学风，遂由此确立了。”（同上书十二《清初学海波澜余录》八）这一议论实际上已明确指出了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社会根源。他还进一步指出，四库馆的设置，说明汉学已经取得胜利，考据之风宣告形成。对此鲁迅先生亦曾有过一系列的评论。如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者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使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是没有效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可见当时“盛世”和“繁荣”的出现，全国人民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能只看到一部《四库全书》，而忘掉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所遭到的浩劫。鲁迅先生说：“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剝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

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这都是“盛世”的统治者所留下的“功绩”，全毁、抽毁的当然已经无从谈起，许多经过“剜去”或“修改”的著作，致使真伪莫辨。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当时那种虚假的繁荣，应当看到，当时的乾嘉考据之学的成就，乃是许多聪明才智之士为了逃避现实之嫌，将自己毕生精力葬送在故纸堆中取得的。鲁迅先生指出：“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众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当时的历史事实说明，乾嘉时代学术界所出现的局面根本谈不上繁荣，它毫无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百家争鸣”景象，而只是死气沉沉的“万马齐喑”局面，各种学科无不千篇一律的考证。当时的社会，不独做学问的人个个竞言考订，就在整个社会上亦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风气。由于当局的有意扶持和提倡，竟成了许多士人进入仕途的捷径。对于这种社会风气，梁启超曾非常风趣地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的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清室帝王并不是被动的“从风而靡”，而是它发现了这种考据学风的“汉学”比之“宋学”对于巩固其统治更为有利，所以对这种学风不仅推波助浪，而且是大力扶持和利用。因

此，乾嘉时代的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纳入了考据的轨道。

生活在当时的章学诚对这种局面深表不满，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许多文章里都批评了这个怪现象，指出“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动引刘子骏言，‘与其过废，无宁过存’，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会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褻积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生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德，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同上书卷十八《邵与桐别传》）。乾嘉时期史家，的确也都象章学诚所说“不求家法”，只知“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整个史学界，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从事于旧史的整理考订工作。尽管为了对旧史研究，曾围绕着这个中心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许多辅助学科，诸如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等等，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对古籍进行整理研究，采用方法虽然不同，但目的还是一致，对旧史进行整理和考订。因此，乾嘉史学的特点和主流亦超越不出“考据”二字。至于象章学诚这样，当时敢于独树一帜，高唱“六经皆史”，大谈“经世致用”，毕竟是凤毛麟角，自然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精神。

以上事实说明，由于清廷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了乾嘉时期社会学术风气大变，与清初相比显然已经大不相同。清初学者治学所关心的是当世之务，他们所提倡的考据，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空言心性、束书不观之弊病，并且与反对清初民族压迫的形势密切相关。他们提倡“实学”，要求